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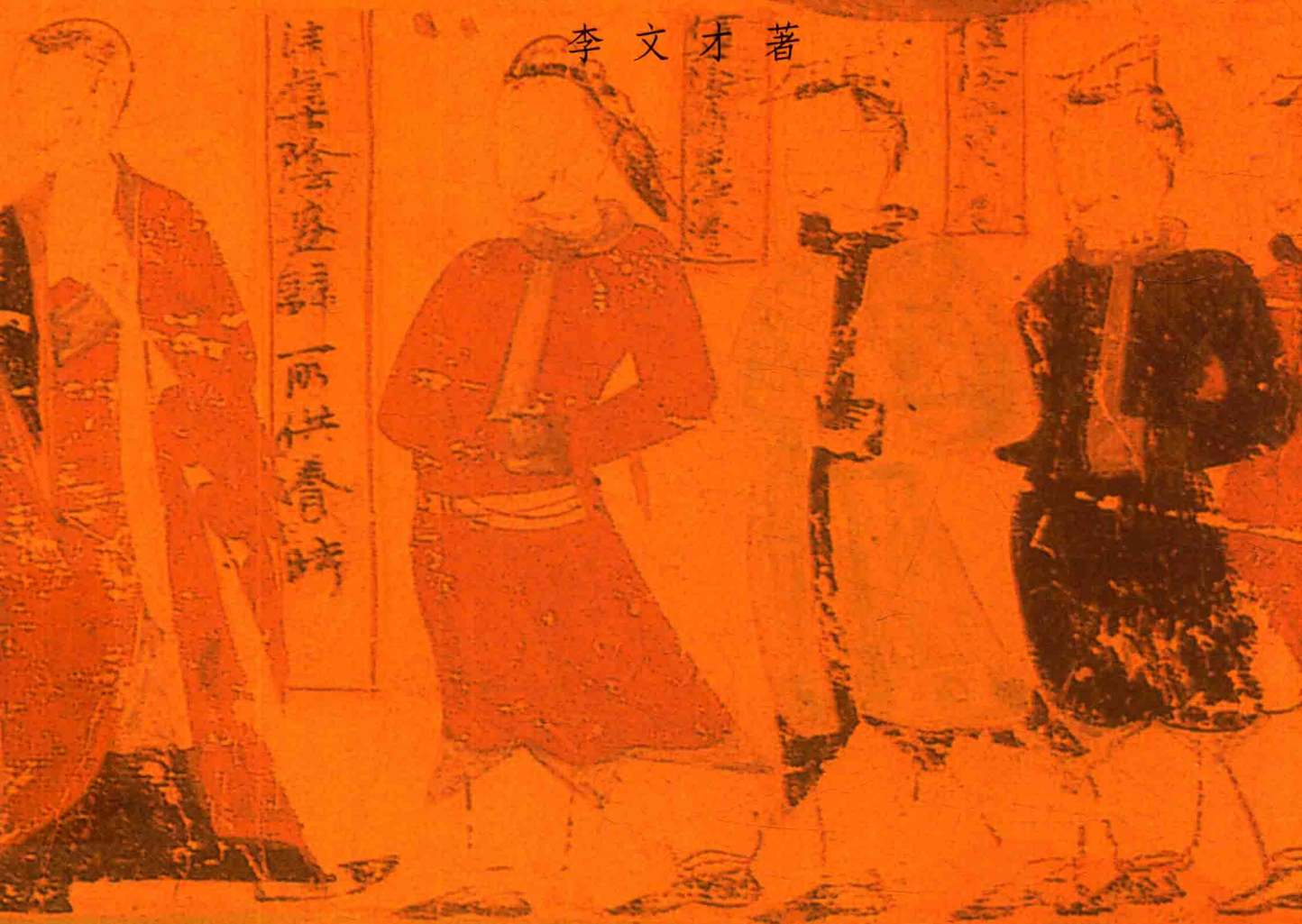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四編 第十一冊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上）

李文才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四編

王明 蔭主編

第 11 冊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上)

李文才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上)／李文才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序 4+ 目 6+170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11 冊)

ISBN 978-986-404-319-4 (精裝)

1. 政治文化 2. 隋唐

618

104014376

ISBN-978-986-404-319-4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404-319-4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上)

作 者 李文才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504881 字

定 價 十四編 28 冊 (精裝) 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上)

李文才 著

作者簡介

李文才，男，1969年生，江蘇東海人，歷史學博士，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1988～1998年，先後就讀於揚州師範學院、陝西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分別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先後在《中國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史》、《漢學研究》（臺）、《慶州史學》（韓）等刊物發表論文八十餘篇，出版《南北朝時期益梁政區研究》（商務印書館，2002年）、《兩晉南北朝十二講》（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9年）、《李栖筠及其政治生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等專著。

提 要

隋唐時期政治發展、經濟繁榮、軍事強盛、文化昌明，為令吾人倍感自豪之強盛時代，故研究隋唐歷史文化，實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振奮民族精神之特殊功用。本書所收錄之論文21篇，涉及隋唐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等多個方面，冀於此有所裨益焉。

其中隋史兩篇，一者討論隋初北邊形勢，及隋文帝之對策；一者以仁壽宮為切入點，剖面分析隋文帝晚年政治心態、政策轉變、太子廢立等歷史情況。唐與突厥對馬邑的爭奪一文，分析唐初北方邊疆安全中的地緣構成問題。以龍朔三年「移宮」、建寧王李倓之死為題二文，關注重點均為統治集團內部權力之爭。圍繞河西、朔方立論的四篇文章，重點關注唐朝前期西北，特別是河西隴右地區的軍事政治問題。圍繞沙州淨土寺籍帳文書三文，討論晚唐五代敦煌寺院經濟的相關問題。與李吉甫、李德裕相關之五篇論文，研究對象均為「贊皇李氏」，涉及李氏父子政治、軍事、思想、學術、信仰等方面。唐初「明堂創制」二文，通過對明堂禮儀的分析，探討禮儀文化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唐玄宗的後宮政策及其承繼》一文，討論唐玄宗的後宮政策及其繼承問題。《田悅及其與夫人冀氏合祔墓誌銘考釋》一文，考鏡墓誌出土時間、條疏清季學人著錄，對墓誌銘文所蘊含的歷史信息進行全面解讀。

序 言

黎 虎

《隋唐政治與文化研究論文集》（簡稱《論文集》）是李文才教授即將出版的關於隋唐史研究的論文集，我有幸先睹為快，拜讀全稿之後，掩卷細思，感覺文才教授在治學上有了新的飛躍，下面淺談一下對其論文集的粗淺認識。

該論文集從專題角度而言，主要體現了作者一些匠心獨運的治學思路，以及近些年來的研究成果。

其一，在政治史研究中善於思考與歷史相關的地域或場所，並充分關注其特殊性及重要性。無論是地理因素，抑或是場所背景，這些具體空間恰恰是歷史事件發生的載體。具體而言，所收錄的兩篇關於隋史研究的論文，對隋朝北邊政局形勢、隋文帝北疆政策的分析，均充分體現對地理因素特殊性的高度重視；對仁壽宮與隋文帝晚年政治關係的分析，則從學界較為忽略的角度，充分關注了地理位置因素所涵蓋的深層次政治問題。《武德年間唐與突厥對馬邑的爭奪》、《河西、隴右、朔方三節度使之軍事地位及其成因》、《唐代赤水軍指揮系統之構成及其特點》、《唐代河西節度使所轄軍鎮考論》、《朔方節度使與唐代中前期西北邊防》等文，乃至《試論〈元和郡縣圖志〉的成就及特點》，雖然都是從不同專題角度所展開的論述，或軍事史、或制度史，然皆可歸屬政治史範疇，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特別關注地理位置、地緣構成等因素對歷史的影響。這與文才教授多年以來對中古史領域地緣政治問題的關注與探討不無關係，此前他的專著《南北朝時期益梁政區研究》（商務印書館 2002 年版），以及發表的《太極殿與魏晉南北朝政治——附論中堂》、《六朝建康之「中堂」》等論文，均高度重視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所或地域。以致於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探討或分析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原因、過程等問題時，

尤其重視歷史事件背後的場所或地域問題，充分體現了文才教授在治學方面的顯著學術特色。

其二，立意高遠而選題新穎。在研讀史料的基礎上進行選題，乃是史學論文撰寫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選擇什麼樣的題目，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了文章的質量。《論文集》選取的論文主題，除前面提及的顯著特色外，還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對於前人已有研究的成果，進行消化吸收，在充分尊重前賢論著的基礎上，以新的視角切入論題，從而得出新認識、新觀點。比如對河西節度使等問題的反思與進一步探討，不囿於學界乃至史學名家的立論，通過細緻而充分的論證、科學合理的分析與推理，從而提出新見解，體現了作者嚴謹的學風。第二，對於一些學界關注不多或未曾關注的問題，作者能夠展開系統研究，比如對於李德裕家族的研究，已呈現系統化的趨勢，作者圍繞「唐代贊皇李氏」，已先後發表十餘篇相關論文，並出版專著《李栖筠及其政治生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年版），首先提出並論證了「贊皇李氏」的概念，對於李氏家族三代的探討，不局限於簡單的人物研究，而是結合宏大歷史背景，凸顯了這些人物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的特色。第三，敢於突破已有研究領域，開闢新的研究方向。文才教授近年來對於敦煌學亦有所關注，一般而言，對於此類新史料或異於傳世文獻的資料，敢於涉足需要相當的學術勇氣，他在前些年撰寫《孫吳封爵制度——以封侯為中心》即使用了當時新見的吳簡材料；在唐史研究中，其對於墓誌材料也注意加以利用，據其介紹，他已搜集了大量揚州石刻文獻，擬進行系統專題研究。在論文集中收錄的《晚唐五代沙州淨土寺相關籍帳文書試釋》、《晚唐五代沙州淨土寺的收入與支出研究》、《飲酒與晚唐五代以後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三篇文章，係利用敦煌寺院籍帳文書所進行的專題研究，這些籍帳文書並非僅僅用為研究的佐證文獻，而是針對這些材料記錄的歷史信息所進行的系統考述。這三篇長文屬於經濟史範疇的研究論文，具體研討對象為沙州淨土寺的籍帳文書，前兩篇主要針對文書本身進行分析，第三篇則拓展至對社會經濟史的全面探討，這三篇相對獨立而有內在關聯的以敦煌文書為依託的學術研究，是文才教授在學術研究領域的最新拓展。

其三，考證嚴密。文才教授嫻於魏晉隋唐史研究，在學術生涯中，堅持論從史出、實事求是的學風，秉承乾嘉學派嚴格考據，以史為憑的學術方法。這在本書集中也有明確體現，如關於河西、朔方節度使的幾篇文章，其中對

於赤水軍指揮系統的構成、河西鎮所轄軍鎮、朔方軍與諸節度使的軍事協作等問題的考證，均可見其堅持史實考據的嚴謹學風，和紮實的學術考據功底。

史論結合，論從史出，是從事史學研究最基本要求，也只有立足於此，方能提出站得住腳的史學認識。通覽全書，無不體現文才教授紮根於史料耙梳的樸實學風。言及基於考證的史料運用，對於《論文集》中的史料運用特點還要補充一點，那就是，文才教授善於從一些特殊題材的史料中搜尋有用的論據，如《唐玄宗的後宮政策及其承繼》一文，就從《太平廣記》所載故事，引入正題；再如《半夜邀僧至，孤吟對竹烹——李德裕與佛教及「會昌毀佛」的關係》一文，則充分利用了李德裕詩文，從而彌補了正史資料的不足。凡此，均反映出他對於史料解讀的別出心裁，以及對史料理解之深刻程度。

以上為本人對該論文集的一些認識，對於該論文集內容我不再一一介紹，相信讀者諸君自有體會。最後，我想談談與文才教授認識以來，對他在學術道路上成長過程的一些感想，或許更有助於讀者瞭解該部著作及作者的用心所在。文才教授的本科學習生涯係在揚州師範學院度過；1992年考入隋唐史研究重鎮陝西師範大學，師從趙文潤、牛致功等先生研讀隋唐史；1995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從隋唐史開始轉入魏晉南北朝史，我年齒在先，忝為其師，迄今我和他相識已二十年矣！文才教授在其二十年的學術生涯中，治學上有一個很大特點，不拘一格而術業專攻。不拘一格，是指他在論文選題方面而言，文才教授的學術研究範圍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為斷代界限，所發表的數十篇論文覆蓋面很廣，單純從題目來看，似乎缺少統一的頂層設計，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習俗，或魏晉南北朝，或隋唐，不一而足；術業專攻，則是指篇篇各異的選題，往往不乏內在的關聯性，如本論文集的很多篇目之間都是有體系的文章。以言整體，文才教授是以其最為擅長的政治史為中心，在此基礎上兼及政治人物、政治事件、軍事、歷史地理、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研究。這些論文用功至深，行文流暢，體現了他對歷史深邃的把握和純熟的史學功力。除此之外，文才教授多年來潛心學術，心無旁騖，勤懇有加，近年來先後出版三部史學專著，一本文集，在當前物欲橫流的時代，能夠甘於坐穩冷板凳，不求虛名、不圖功利，君子固窮，實屬難得也！

2015年3月10日於北京師範大學



目次

上 冊

序言 黎虎

隋初北邊形勢及隋文帝之對策	1
一、弁言	1
二、隋初外部形勢分析：以北部邊疆爲中心	2
三、隋文帝經略北疆的舉措	12
四、隋朝北疆邊防政策的轉變	24
仁壽宮與隋文帝晚年政治之關係	27
一、史籍所載仁壽宮營造之背景	27
二、仁壽宮與隋文帝晚年政治運作	30
三、仁壽宮與開皇末年四項政治決策	38
四、太子廢立與隋文帝父子權力爭奪：高潁被黜的真相	43
五、空間疏離與隋文帝父子權力之爭：劉居士案索隱	48
武德年間唐與突厥對馬邑的爭奪	55
一、新城之戰的背景：李大恩在代北的軍事活動	56

二、馬邑會戰的設想：李大恩軍事活動蹤跡探蹟	63
三、成也馬邑，敗也馬邑：劉武周勝敗原因探析	68
四、武德六年唐與突厥交兵：以馬邑爭奪戰為中心	72
五、以夷制夷：唐朝與突厥的和親談判	76
武德、貞觀時期關於明堂興造問題的討論	83
一、武德時期有關明堂祭祀禮儀的討論	84
二、貞觀時期有關明堂建築形制與明堂禮儀的討論	86
三、武德、貞觀時期未建明堂的原因分析	94
明堂創制的構想與唐高宗的政治心態	103
一、「九室」內樣：永徽年間明堂形制的初步構想	103
二、「創此宏模，自我作古」：總章時期明堂形制的確定	107
三、「思革舊章，損益隨時」：唐高宗創制明堂的政治心態	114
四、餘論：唐高宗朝明堂未能建立之原因	117
唐高宗龍朔三年「移宮」之背景及影響	121
一、龍朔三年「移宮」之背景：以史籍所載為中心	121
二、龍朔三年「移宮」之真相：帝后權力爭奪	126
三、龍朔三年「移宮」之影響：南衙北司之爭與皇位繼承制度的變化	134
河西、隴右、朔方三節度使之軍事地位及其成因	143
一、三節度使的兵力配置及其地位	144
二、新軍事制度變革與三節度使地位之形成	152
三、唐朝前期軍事活動與三節度使地位之形成	158

中 冊

唐代赤水軍指揮系統之構成及其特點	171
一、緒論	171

二、歷任赤水軍（大）使考述	172
三、赤水軍副使及基層軍官考	191
唐代河西節度使所轄軍鎮考論	201
一、墨離軍	203
二、赤水軍	208
三、建康軍	210
四、新泉軍	213
五、豆盧軍	215
六、玉門軍	218
七、大斗軍	221
八、寧寇軍	223
九、白亭軍	227
十、張掖守捉與交城守捉	229
朔方節度使與唐代中前期西北邊防——以「安史之亂」前西北地區的戰略協作為中心	231
一、朔方節度使及其所轄軍鎮之成立時間	233
二、朔方節度使所轄軍鎮之地緣構成及武力配置	239
三、朔方與西北軍事格局諸節度之間的軍事協作	244
唐玄宗的後宮政策及其承繼——兼論唐玄宗和楊貴妃關係之真相	253
一、唐玄宗後宮政策之內涵確定	254
二、唐玄宗後宮政策之繼續	262
三、唐玄宗和楊貴妃關係之真相	272
唐肅宗時期建寧王李倓之死的真相	283
一、史籍所載建寧王李倓死後之恩寵	283
二、元帥之位的爭奪與儲位繼承	285
三、權力之爭與建寧王李倓之死因	290
四、唐代宗「手足情深」之真相	296
晚唐五代沙州淨土寺相關籍帳文書試釋	299
一、領得歷——財物交接明細帳目	300
二、入歷——收入明細帳目	307

三、破歷——支出明細帳目·····	316
四、附論：沙州儼司「大眾儼利」收支決算 報告·····	341
下 冊	
晚唐五代沙州淨土寺的收入與支出研究—— 基於對 P.2049 號背籍帳文書的考察·····	351
一、925 年淨土寺收入之分析·····	353
二、925 年淨土寺支出之分析·····	360
三、925 年淨土寺之酒水消費支出·····	374
飲酒與晚唐五代以後敦煌佛教的世俗化—— 以 S.6452-3、S.6452-5 號文書為中心的考察·····	381
一、淨土寺的酒水來源：常住酒庫與「酒戶」 ·····	382
二、淨土寺酒水支出的數量、頻率、構成及 其意義·····	392
三、淨土寺酒水消費的性質分類·····	397
四、敦煌寺院飲酒的背景與原因·····	406
李吉甫的政治活動及其評價·····	411
一、李吉甫仕宦生涯簡述·····	411
二、李吉甫反對藩鎮割據的活動·····	414
三、李吉甫整頓邊防與籌邊禦侮的措施·····	417
四、李吉甫關注民生與改革內政·····	421
五、對李吉甫的政治評價·····	424
試論《元和郡縣圖志》的成就及特點·····	427
一、承前啓後的歷史地位·····	428
二、實是求是的學術風格·····	429
三、服務現實的實用價值·····	433
四、效忠皇權的軍事主旨·····	438
李德裕政治思想研究·····	447
一、尊崇君主，強化皇權的思想·····	448
二、「專任」賢臣與君主「獨斷」相結合的 思想·····	450
三、不圖虛名、「婉辭」進諫的主張·····	453

四、立功求名與反對「朋黨」的思想	455
五、爲政「尙權變」的思想及其權力觀剖析	459
李德裕軍事思想研究	463
一、君主執兵，強軍衛國的軍隊建設思想	463
二、立足於己，積極防禦的國防建設思想	472
三、政治攻勢與軍事鬥爭相結合的思想	479
四、外交活動與軍事鬥爭相結合的思想	481
五、機動靈活，方法多變的戰術思想	483
半夜邀僧至，孤吟對竹烹——李德裕與佛教及 「會昌毀佛」的關係	491
一、李德裕詩文中與佛教有關的作品	491
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見李德裕與佛教 之關係	497
三、李德裕與「會昌毀佛」	506
「吳湘之獄」再探討	515
一、有關「吳湘之獄」的文獻記載	516
二、「吳湘之獄」案情之剖析	519
三、覆審「吳湘之獄」之真相	526
四、從「吳湘之獄」看唐代官員犯罪之司法 審判程序	529
田俛及其與夫人冀氏合祔墓誌銘考釋	533
一、墓誌錄文	533
二、墓誌出土時間及清代學者的相關考釋	536
三、墓誌銘文所載史實考釋	542
四、餘論	551
參考文獻	553
後記	561

隋初北邊形勢及隋文帝之對策

一、弁言

隋文帝受禪前後，內憂外患迭起，史言「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

〔註1〕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五月，楊堅以后父的身份入宮輔政，當其獨攬朝權而又立足未穩之際，六月，地方上即發生了相州治總管尉遲迥、鄴州總管司馬消難、益州總管王謙相繼起兵的事件，是為「三總管之難」，亦即所謂「三方之亂」；朝廷內部則出現以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等為首的宇文氏宗室「六王」陰謀反對。因此，楊堅要在短時間內牢固地控制朝政，也並非輕而易舉。

儘管「三方」很快被壓平，「六王」也相繼被誅滅，然尉遲迥起兵之後，「趙、魏之士，從者若流，旬日之間，眾至十餘萬。又宇文弼以滎州，石悉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羅以兗州，皆應於迥。」〔註2〕司馬消難在鄴州起兵響應以後，「淮南州縣多同之」。〔註3〕凡此均表明，楊堅如果不能及時、恰當地處理好這些問題，則極有可能引起全國性的叛亂，這就是楊堅執政以後所面臨的國內嚴重局面。與此同時，楊堅所面臨的外部形勢，似乎更為嚴峻。從南方來說，江南的陳氏王朝，雖然已經腐敗不堪，但一日存在，便一日對中原政權構成威脅，南方邊境「蠻夷猾夏，荊揚未一」的局面，顯然仍

〔註1〕【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卷二《高祖紀下》，第54頁，北京，中華書局，1973。

〔註2〕《隋書》卷一《高祖紀上》，第3頁。

〔註3〕《隋書》卷一《高祖紀上》，第4頁。

是楊堅執政時所不能不嚴重關切的問題。北方所面臨的形勢更爲嚴重，以突厥、高麗、吐谷渾等爲領頭羊的北邊諸族，自西北至東北形成的巨大包圍圈，對周、隋王朝的北方邊境造成了空前壓力。

綜合楊堅受禪前後的內外形勢來看，尤其以北部邊境的複雜局面最爲棘手，這直接影響到隋朝建國後的邊防政策。寡見所及，研究隋朝政治史，尤其是隋唐之際邊疆史者，對於隋朝初年北邊形勢、隋文帝爲鞏固北部邊所採取的對策，以及隋朝北疆政策的轉變諸問題，關注的力度似稍嫌欠缺。今不揣譾陋，試爲發明一二焉。

二、隋初外部形勢分析：以北部邊疆爲中心

（一）建國初期的隋陳關係

隋文帝得政之時，江南陳朝政權已然腐敗，但覬覦中原的野心並未完全泯滅，南北雙方之間的摩擦鬥爭依然頻繁激烈。如尉遲迥起兵以後，不僅主動「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而且「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註4〕尉遲迥試圖以割江淮之地爲代價，換取陳朝的援助。對於尉遲迥舉兵反對楊堅，陳朝立即回應，不僅接納尉遲迥送來的質子，並且派兵北上；及司馬消難舉兵響應尉遲迥，也以其子司馬泳入陳爲質，請求陳朝出兵干預。陳朝對尉遲迥、司馬消難等人的支持，目的即在於獲取江、淮之地。及司馬消難被王誼擊敗以後，又率殘部入陳避難，陳朝不僅爲之提供庇護，且任以官職。〔註5〕

陳朝不僅以實際行動積極支持楊堅的反對者，而且不時派兵北上，對江淮地區展開軍事行動。史言「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註6〕此處所言陳朝幾路出兵，均因其時「三總管之難」而起，儘管陳（慧）紀、任蠻奴（即任忠）等幾路人馬皆無功而返，但樊毅所部在長江中游的沔、漢地區，還是因爲司馬消難的歸降，攻取了北周（隋朝）的重要軍事據點甌

〔註4〕【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卷二一《尉遲迥傳》，第35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1。

〔註5〕《周書》卷二一《司馬消難傳》：「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荊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隨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隨公。」（第354～355頁）

〔註6〕《隋書》卷三九《源雄傳》，第1154頁。

山（軍鎮名，在今湖北漢川縣南）；周羅睺所部則攻佔了胡墅（在今江蘇南京江北浦口一帶）。開皇二年（582）九月，隋文帝不得已，任命長孫覽、元景山為行軍元帥，以高穎節度諸軍，率兵南伐。及元景山兵出漢口，陳朝甌山守將棄城遁逃；次年（583），陳朝遣使請和，並歸還胡墅，高穎遂以禮不伐喪為名，奏請班師。

以上就是隋文帝建國初期，隋、陳兩國關係的大致情況。一方面，隋、陳兩國雖然軍事衝突不斷，但規模都不大；另一方面，儘管陳朝積極支持隋文帝的反對勢力，但隋文帝亦未有大舉伐陳的打算，用兵規模也僅局限於收復司馬消難反叛時的失地而已。隋文帝何以在對待陳朝一系列帶有挑釁性的行為面前，表現出極大耐心和剋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其建國前後，鞏固內政為頭等大事〔註7〕；二是因為隋朝北方邊境受到突厥、吐谷渾等襲擾，所承受的軍事壓力更為緊迫。鞏固內政與攘除北邊外患這兩大窘迫事務，迫使隋文帝只能暫時將伐陳事宜置後，因為儘管陳朝政權最終也將是楊堅必須解決的重要外患，但目前尚非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時機。

（二）隋初西北邊疆形勢：突厥、吐谷渾與党項

隋文帝建國初期所面臨的外患，主要不是來自江南的陳朝政權，而是長期遊弋於北方邊境的草原民族。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混亂之後，北方少數民族的勢力進行了重新整合，也得到了更大發展。至周隋之際，北邊少數民族強大者，有突厥、吐谷渾、党項諸族，而遼東地區的高麗也屢屢對中原王朝進行武力侵擾。其時，隋朝北境的最大威脅來自突厥，突厥之強盛始於木杆（俟斤）可汗，史言「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註8〕木杆死後，傳位於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註9〕因此，隋文帝建國以後，欲解決北部邊患問題，首先就是突厥，其次則是位於突厥西

〔註7〕 呂思勉撰：《兩晉南北朝史》（上冊）第十五章第三節《隋并梁陳》有云：「自周滅北齊之後，北方吞并之勢已成，隋文帝篡立之初，內憂未弭，故與陳仍敦鄰好。」（第78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由此可知，隋文帝在建國前後，出於穩固內政及北部邊防等方面的考慮，主動向陳朝示好，乃是一種政治策略。

〔註8〕 《隋書》卷八四《北狄·突厥傳》，第1864頁。

〔註9〕 《隋書》卷八四《北狄·突厥傳》，第1865頁。

面的吐谷渾。如已故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芮沃壽氏就曾經指出：「王朝在軍事上面臨的一大問題，依然是來自北方的外患。在王朝最初幾年，北方邊境遭到突厥和吐谷渾的嚴重襲擾。」〔註 10〕史學大師呂思勉氏也說：「隋初外患，莫如突厥。」〔註 11〕突厥之爲患於周隋之際，《隋書》、《周書》、《北史》、《資治通鑑》諸史載之甚詳，自無需多加闡述。唯吐谷渾、党項兩族，對於其時周、隋兩朝之威脅，往往因爲人們過多關注突厥之擾邊問題，而易被忽視。

徵諸史載，吐谷渾對於中原王朝的侵擾，自魏晉南北朝時期已然。吐谷渾，本爲慕容鮮卑同種，後因內部發生權力之爭，吐谷渾率眾西遷，止於甘松之南，洮水之西，並以吐谷渾爲國號。北魏劉宋對峙時期，吐谷渾基本依違於南北雙方之間，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曾經多次冊封吐谷渾，北魏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也先後多次遣使對其冊封，太武帝拓跋燾還曾就吐谷渾稱臣納貢之事，召開人數多達二百七十九人的公卿集議，商討相關對策。但就其間吐谷渾與南、北雙方的關係來看，吐谷渾雖然同北魏確立了稱臣納貢的藩屬關係，但雙方的軍事衝突始終不絕；吐谷渾和劉宋之間則不存在這方面的問題。〔註 12〕

吐谷渾在處理和南、北朝的外交外關係時，採取了一種兩屬南北的騎牆政策，主要是由南、北朝雙方與吐谷渾在地緣構成上的關係所決定。當北魏疆土囊括關隴，並呈進一步向西北地區拓展的態勢之後，它和吐谷渾的衝突就在所難免了，太武帝拓跋燾晚年、文成帝拓跋濬、獻文帝拓跋弘時期，北魏和吐谷渾之間曾多次交兵，原因即在於此。吐谷渾和北魏長期爭戰，直到文明馮太后去世，孝文帝元宏獨立執政以後，才真正得以緩和，及孝文帝駕崩，吐谷渾王伏連籌遣使赴哀，極盡誠意，此後直到宣武帝元恪統治時期，吐谷渾每年都向北魏納貢稱臣。〔註 13〕

及六鎮亂起，北魏王朝行將崩潰之際，吐谷渾也開始參與到北魏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儘管其活動範圍仍基本局限於河西一帶，但與北魏王朝

〔註 10〕 【英】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隋唐史》，第 102 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註 11〕 呂思勉撰：《隋唐五代史》（上冊）第一章第二節《文帝外攘》，第 9 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註 12〕 【唐】李延壽撰：《北史》卷九六《吐谷渾傳》，第 3178～3185 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

〔註 13〕 《北史》卷九六《吐谷渾傳》，第 3182～3185 頁。